

省、市机关干部中几个右派分子 的典型材料

从前一段省、市一级机关大放大鸣中，暴露出来为数不少的一大批右派分子，其中有一般的科員、办事員，也有科長、处長一級的干部；有一般非党羣众，也有相当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据初步統計，机关干部的右派分子中，共產黨員占7.6%，共青团員占17.4%）。从这里所輯錄的一部分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右派分子丑惡的真面目。不管他們用的是什么样的借口，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他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堅持資本主义立場，反对社会主义和共產党的領導。

这里輯錄的几个右派分子的典型材料，是从現有材料中初步選輯出來的。有些早位在运动中也暴露出一些比較典型的右派人物，希望及时的把材料整理送來，我們准备以后繼續加以选輯印發。

中共广东省委整風办公室

1957年7月25日

目 录

省委统战部右派分子黃可夫材料.....	(1)
省委講師团右派分子林鵬材料.....	(2)
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項志調材料.....	(5)
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陈識材料.....	(7)
省水利廳右派分子許志材料.....	(11)
省交通廳右派分子美中材料.....	(13)
省城市建設局右派分子黃頻華材料.....	(16)
省服务廳右派分子藍宗棉材料.....	(17)
广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張象賢材料.....	(18)
广州市衛生防疫站右派分子罗中浩材料.....	(21)

一、省委统战部右派分子黃可夫材料

黃可夫（黨員，工商處處長，家庭成份地主，1935年參加革命，1942年在東江，因與敵鬥爭不利，組織叫他回家隱蔽待機行動。黃到偽派出所當書記，給一個反共犧牲者寫祭文，謾罵共產黨，1948年受到黨的警告處分；土改時不依靠大軍，階級立場模糊，對抗領導，不服從組織決定，受黨內警告處分。）其主要錯誤言論是：

1. 歷次運動多是“左”、“靠壓”“不能解決問題”，“肅反不是實事求是，是左了，打擊面大，對積極分子要重新審查”。

2. 今年4月間工商聯召開家屬會議，黃在會議上說：工商聯幹部對資本家尊重不夠，安排使用不當，還說“我認為右傾不是什麼錯誤，左傾才是錯誤”。

3. 黃對儲安平說國務院12個總理沒有一個非黨人士，認為值得考慮。

4. 在6月2日大放大鳴時羅范羣副部長擬了一個電報通知全省地（市）委统战部系統，指出對民主人士、文教、衛生、科技、工商、歸僑、小商販如何掌握大放大鳴。黃後來又擬了一份電報將羅擬的其中一段重要部分擅自刪掉，便徑送廳部長批發。被刪的一段是“發言不要硬性規定範圍，放手鼓勵資本家大放大鳴，放、鳴與第五次私改會議方針是一樣的，放、鳴是暴露我們的缺點、錯誤，改進工作，也是為了對症下藥，更有效的進行工商界的改造工作。”被黃改後的電文，根本就沒有什麼指導意義。

5. 他說：在公私合營企業里除政治工作外，不要再說私方代表服從公方代表了，應按副職服從正職就行了。

6. 羅范羣同志從汕頭檢查工作回來後，說資本家有積極性，但消極方面也有所滋長。黃反對這種看法，在同志們面前公開說：羅副部長在汕頭抓到一點材料就隨便下結論。

7. 合營企業工資改革指標規定是3%，黃強調廣東特殊，資本家苦，主張放寬一些。

8. 認為李維漢同志提出的對資產階級劃分左、中、右的標準太空洞，如果按這樣劃就沒有左派了（李提出是以勞動人民立場，積極為人民服務才能算左）。又認為：毛主席的六項標準太高了，按照這樣，就沒有左派，都變成右、中右派了。

9. 資本家林永平調到工商聯當副秘書長時，黃擅自對工商聯黨文訓處要提林為14級

（林在江門市任副市長時17級，調廣州時已提為16級），并要把林擺在陸堅的前面。此事既未通過部務會決定，干部處也不知道。郭就和林談了，只好提為15級。現林為全省出名的右派分子。

10.黃為工商處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對省委關於機關整風提出的要求“分清是非，改正錯誤，反右派，提高思想”，在向處里傳達時，只說“分清是非”。

11.說：西江整隊縣級干部百分之百垮了。

12.該部工商處干事丁身曾曾在整風中發表下列言論：1.同意章乃器對資產階級的看法。他說“我們強調兩面性是有缺點的”。2.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没有什么區別的”。3.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現在搞階級鬥爭不夠妥當”。他不同意“波、匈事件是隱蔽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說法”。認為是“左傾”。黃可夫表示同意丁的看法。

二、省委講師團右派分子林鵬材料

林鵬，省委講師團理論教員，中共黨員，副科級干部。土改整隊、三反、肅反運動中均曾被鬥爭。鳴放運動中，林鵬又以“陶書記主觀主義，干部受災”和“運動和‘死人’”為題寫了兩篇大字報，否定土改整隊、肅反等運動的成績，把運動描寫得漆黑一团，陰森可怕，認為省委領導主觀主義，使“干部受災”。并說：“在每次運動來潮的時候，总是有那么多吊頸鬼、跳樓鬼、食藥（服毒）鬼、割頸鬼、槍打鬼以及其他自殺鬼頻頻來臨”。他認為土改運動中原來縣一級干部相當部分垮台了，區一級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區以下更不必說。“三反”中許多干部被說成‘老虎’下台了，不少人受過極刑甚至送了生命。肅反中也有80%是搞錯的，錯誤的原因與省委領導有極大關係。和林鵬一個鼻孔出氣的還有中級黨校的學員馮華和佛山地委宣傳部副科長陸筠等人。

現將林鵬寫的“運動和死人”“陶書記主觀主義，干部受災”兩篇大字報附后：

（附一）陶書記主觀主義！干部受災！

不可懷疑，這幾年來，省委領導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是巨大的。因為基本上完成

了广东二次革命的任务。但不可否认：这几年来省委領導也發生了不少的偏差和錯誤。可以說：“在基本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時，也錯傷和冤枉了許多革命同志和人民。”

當然，蒙受這種冤枉比蒙受斯大林同志的冤枉要好受的多，但應該看到這種冤枉並不好受，有時甚（至）比死還痛苦，因為他們在政治上、良心上、革命人格上受到創傷。

有什麼偏差和錯誤呢？請大家回顧一下吧！

第一、在上改運動中，原來的干部縣一級的相當部分垮台了，區一級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區以下更不必說了。他們為什麼垮台呢？不可否認：他們思想上、立場觀點作風上是有些毛病的，但不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有的只是極個別極少數的），然而他們那時許多卻受到了以上的待遇。

第二、在“三反”中，許多干部被說成是“老虎”下台了，不少的人受過極刑甚至送了生命，其實真正的“老虎”却是極少，大部分則是小毛病而已。

第三、在“肅反”運動中，我估計在全部干部中有10%左右的干部被作“對象”來鬥爭了，被管制了，而結果打出的真正反革命分子，不會到2%，也就是80%搞錯了，革命成了反革命，可見偏差是不少的。許多人不應下台的下台了（可以說他們可以和我们現在省委不用下台一樣，而不必下台），不應鬥爭的被鬥爭了。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的偏差呢？

也不可否認：“革命不是綢花”，一點不過火那是很難避免的，但除此之外，陶書記的主觀主義有極大關係，只有主觀主義才會使許多干部受災。

陶書記有什麼主觀主義呢？我沒有當過他的隨員，也沒直接和他交談過，本無從知道，而且上面所說的偏差亦不是他直接干的，本來也怪不得他的。但關鍵問題在於領導，特別是從他的一次講話中我懷疑就是由於他的主觀主義才會發生如此大的偏差。

陶書記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講話呢？那就是1952年6、7月間，在華南分局党校對學員講話，他說：“我到廣東後看出：廣東地近港澳，封建勢力濃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們估計（大概指整個省委）廣東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們的，縣一級的干部大部分是我們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區以下的干部則小部分是我們的，大部分是人家的（我的理解：我們是共產黨，人家就是敵人）。”大家看看，幾年來廣東工作的偏差很多，干

部被打垮，和陶書記的指導思想不是十足十的（疑漏二字——編者）嗎？以上所說的現象，不是陶書記主觀主義的具體實際反映嗎？

陶書記的估計對嗎？我說前半段對了一半，後半段一大半沒有（講）對。現在事過好幾年了，我希望省委調（查）一下，統計一下，到底當時（1952）縣一級干部有多少是人家的？區以下的干部又有多少是人家的？

當然，省委書記對某些問題估計不完（全）對是不足為奇的，誰能百分之百正確？但是這幾年來，我從來沒有看見書記正視至少是公然承認這種估計不對。在這次整風中，我希望，誠懇的希望陶書記及有關的省委檢查這種主觀主義，並徹底糾正以上的說法。

鳴（即林彪）

1957年6月14日

附注：鳴是我的暫時筆名，如果我放的是毒（草），我立即可以公開真名受責。

（附二）運動和“死人”

（首先說明：我這裡說的“死人”不包括地主、剝削階級、反革命敵特、土匪在內，而指的是勞動人民和革命干部）

在過去幾年（從1949年至1956年），雖不能說凡是“死了人”都是在搞運動，但運動一來確實是有“死人”，不信，大家想想：不僅土地改革有“死人”，“三反”有“死人”肅反有“死人”，就是鎮壓統購統銷、辦合作社、貫徹婚姻法……等等也有“死人”，好象“死人”和運動形影不離似的，在每次運動來潮的時候，總是有那麼多吊頸鬼、跳樓鬼、跳水鬼、食藥（服毒）鬼、割頸鬼、槍打鬼以及其他自殺鬼等等頻頻來臨。為什麼運動總是有死人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他們經不起考驗，喪失做人信心，或者是受壞人的恐嚇等等，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的強迫命令和我敵（應為敵我）不分。為什麼干部會強迫命令敵我不分呢？當然，這亦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是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單純任務觀點；其次，尚有些違反紀紀的人，但是這與省委領導有沒有關係呢？我認為有極大的關係，這就是：第一、省委主觀主義分配任務；第二、從某些方面來說，在過去幾年中，是鼓勵強迫命令的。有事實例證：沒有充分根據，但從某些現象看來是有理由的，這就是過去幾年中省委在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方面往往是越左

的人越受重用的。而且对那些違反強迫命令我敢不分的高级干部（原文如此）从来至少是很少沒有（沒有二字是多余的）批評过的（下級干部确实是处分了一些）。比如：最近（近）中山大学揭發的龍潛違法亂紀逼死人命的事。省委知不知道？批評过了沒有？又比如，在土改时候，西江的×××書記說：雇貧農80%是地下軍，土改不搞出地下軍不算發動，以致發生了羅勒土改干部用逼供訊的办法制造假案，害死好几个農民的事。这些事情省委知不知道？处分了沒有？好象沒有，而且上面所說的干部还是升、高升、連升三級！

所以过去很多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我想干部強迫命令嚴重，运动死人和这不能无关系吧！在这次整風中，我希望省委要很好的檢查这个问题，并希望切实調查一下各次运动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对“死人”应作出适当結論和处理。

再鳴（即林鵬）1957年6月15日

三、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項志潤材料

項志潤，男，23歲，共青团員，湖北武漢人，家庭出身小商人，个人成份学徒，1951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南新华書店、中南文化局、广州市文化局工作，1956年7月調省監察廳任办事員。

項志潤在大鳴大放中在大字报上公开反对肅反运动。他認為：肅反有“嚴重錯誤”，还有“不少地方是違反憲法的”，如果有人說肅反运动的成績是主要的，那是“替肅反中的錯誤進行包庇”。他竟狂妄地提出：“把毛澤东当作敌人來斗，看是否也經得起考驗”。肅反的錯誤，應該“怪中央”，“中央應該檢討，把中央負責領導這項工作的羅瑞卿从部長的位置上擱下來”。

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他說：“在现实生活中告訴我們並沒有完全享受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按：指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并且“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黨員的秘密監視”。他还說，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只体现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等。

现将項志潤所寫的“談肅反运动”，“談民主与自由”兩篇大字报附后：

(附一) 談肅反運動

肅反運動在維護國家利益，保護勝利果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這個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我擁護毛主席所說：“有反必肅”的政策，可是我們前去年進行的肅反情況如何，我分不清他缺點是主要的還是成績是主要的，我覺得肅反運動是又有嚴重的缺點，又有嚴重的錯誤，還有不少地方是違反憲法的，事例不必復舉，就拿斗錯來講吧！據我所接觸到的一些單位，斗錯的人達90%，有的達100%，斗出來的絕大多數是過去歷史上有點污點，這難道不是嚴重的錯誤嗎？特別是在鬥爭中對人身的攻擊和侵犯人權，憲法第八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肅反運動中對錯鬥的人進行殘酷的鬥爭，打人罵人，笑起來限制吃飯、穿衣、睡覺、通宵戰等，我覺得不少地方是侵犯人權；事先沒有充分掌握材料，就進行鬥爭，我覺得完全是錯誤的。

有同志講，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不可避免，我覺得這是替肅反中的錯誤進行包庇，難道只看了成績的一面，為什麼不估量嚴重錯誤一面呢？如果你把，把毛澤東當作敵人來鬥，看是否也經得起考驗，我們黨從來是提倡實事求是的，那麼肅反為什麼不實事求是呢？這主要是把感情估計錯了，這種錯不怪省和單位領導，而怪中央，是中央沒掌握對頭，不然全國就不會發生這麼多問題，中央應該檢討，把中央負責領導這項工作的羅瑞卿從部長的位子上挪下來，那才叫鬥爭錯了的人甘心。

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對善良正直的人們進行殘酷鬥爭就不必要，是非常嚴重的，錯，應該平反，向鬥爭錯的同志道歉。

(附二) 談民主與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又規定我們國家是人民民主國家，但在現實生活中告訴我們並沒有完全享受這個民主與自由的權利，還有些地方受到人為的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例如，我們的言論，假如你在生活里講錯一句話，或者發過對黨、對現實生活不滿的話，甚至是批評政府、批評領導，馬上就給你扣上反革命，反黨的帽子。我們許多言論都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黨員的秘密監視，遇上甚麼運動來了就把你鬥爭一番，進行非法人身攻擊，肅反許多地方就體現這樣，我覺得只要是每個公民，只要他熱愛我們的祖國，擁護政府，就應有言論的

自由，人身攻击应受到保护。

結社那就更受到限制，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一起談談心，或是組織甚么联誼会，就認為是小宗派，你参加甚么羣众組織要經過審查批准，搞反運動甚至把所謂單身漢“寡老团”也拿來追查，民主生活在我們國家机关更受到限制，將人分成好多类等級，那类可以看香港大公报，那些人可以知道外國消息，那些人可以出席甚么會議，其实，我看就是我們看香港大公报知道外國消息，假如我們热爱今天的政府，也不会把我看絕的，为甚么对人限制那么死呢！

我們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不少地方，只体现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羣众向領導提好意見，提建議，但官僚主义可以不理采，可以給你集中掉，但是羣众就沒有集中錯了之权，不是么，我們領導上布置許多任务不完成也要完成，你就沒有权去否定。

甚之，还有許多侵犯人身自由个别例子就不必枚舉。

四、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陳識材料

陳識，省監察廳一科員，羣众，家庭出身旧人員，个人成份职员，搞反时被斗过，現将其在运动中所暴露的主要言論，附于后：

（附一）为罗翼羣、云应霖抱不平

这篇文章是在6月19日寫成准备給南方日报的，后来觉得意見不成熟，所以沒有送去。但在思想上对于报纸上对罗、云二人的批判文章有很多是不同意的。我認为这是不实事求是的，虽然我也是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論点，如罗翼羣怀疑稅收过重致人民生活苦等論調，我是不同意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所揭發的材料，我認为还不能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同时在歷史上的錯誤（如云应霖），也不能作为肯定他今天言論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依据。

× × × ×

前一时期，报上刊载不少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評，有助于整党和改进今后的工作，其中虽然也夾雜着一些象葛佩琦这样的仇視党，反社会主义言論，但我們对整个情况

該怎樣的估計呢？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我認為总的情况是很好的，應該繼續讓大家大放鳴，對於不利社會主義……言論，要批判，要發動大家來爭，以明是非，對於反革命言論行為，則堅決鎮壓。

但是最近幾天來，報紙的報導中心，似乎離開了整風，而將矛頭轉向批判民主黨派中某些所謂有錯誤的言論的人身上去了，“放”和“鳴”是寂寂無聞了，這個轉變不能不使人懷疑：黨所提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心是否因為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挑撥，別有用心的人寫寫恐吓信，大部分人善意的，但也較尖銳的批評而有所動搖了？在現在黨報對“右派”“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反擊中，使人懷疑黨是否繼續貫徹言者無罪的方針，繼續鼓勵人們知無不言。

這就是“反社會主義”嗎？

羅翼羣被扣上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就是他在座談會上說過：廣東人民在解放後大部分生活有好轉，但還有一部分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口，生活未改善，雖無餓死，但因病無錢醫或因營養不良而死者，也可以說是接近餓死的邊緣。云應霖因為同意羅翼羣的論點，也被扣上同樣的帽子。到底他們所說的有無根據呢？如果不是閉著眼睛的人，如果他是唯物主義者，他就不能否認這種事實，以廣州市失業的××萬人民的生活情況來看吧，難道這些人生活都一定比解放前提高了嗎？難道這些人就都像報紙上某些人所說的都是原來的地主官僚貴族和資本家嗎？不見得吧！從海南島今春自殺的羣眾的數字、成分，和原因來看，恐怕也不是都是地主，生活都比解放前好轉吧？我們中國原來就是非常貧窮落後的，要在解放後幾年內全部人民生活都提高了，這豈不是神話，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既然不能否認確有一小部分人因為失業，因為天災，以及某些地方領導生產上有缺點，農產品價格定得不甚合理，因而生活還很苦，有些人提出請黨和政府注意，這難道就是“反社會主義”了嗎？我想不通，近兩天報紙對云應霖的言論看光了些，如說他在人代會上說過海南人民生活太苦了，這點，也應作具體分析，是否苦呢？拿什麼標準去衡量呢？從一個最低的生活標準去要求，也可以說是苦，說这样的话，縱然是開玩笑糊塗了些，但又怎能從這句話得出“反社會主義”的結論呢？

這不是甚麼批評，而是斷章取義，是歪曲，是粗暴的壓。

現在報紙上對羅翼羣、云應霖的批判，充滿着教條主義“左”傾的論調，處處都出現毫不講理，歪曲人家說話的原意，如羅翼羣明明是說廣東人民大部分生活好轉，

一部分未好轉，有些因病無錢醫……也可以說是在餓死的邊緣。云應霖同意他這樣說，但報紙上批判他們兩人的論點“都是無中生有或斷章取義”，硬說人家就認為全廣東人民都在餓死的邊緣等等，如19日南方日報黃樹全等就是這樣，還有不少工人、部分農民以自己的家庭生活好轉的事實來批判人家。這樣當然也可以，但卻太過牛頭不對馬嘴了，因為誰也沒有說過解放後人民生活都沒有改善提高，相反的，被稱為“反社會主義”的羅翼羣、云應霖反而說大部分人民生活沒有好轉。批評人家，連人家的論點都不清楚，連人家明明白白的意思都讀不懂，豈不是笑話。如果每個人都象現在報紙上出現的論調那樣的邏輯來推論，那麼，問題就太多了，甚至連南方日報也有可能同樣被人扣上這頂“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人家也可以根據關於化縣事件的社論來說这样的话：“難道我們久經鍛煉的偉大的共產黨，竟會有這樣軍閥作風的黨員嗎？”同時如果大多數優秀的共產黨員挺身出來質問說：“我們都是好黨員，都是勤懇地為人民服務，你們怎能把共產黨說是這樣壞呢？”假如真的有人也象現在報紙上流行的教條主義斷章取義者那樣問到你們以上問題，你們會不會服氣呢？你們何以為對？其實只要冷靜地看看人家的講話，就不容許這種不實事求是，不是心平氣靜的粗暴批評，充滿報紙篇幅的、奇怪的是南方日報倒覺得這些文章很合口味。

要提防敵人的陰謀，不要上他們的當。

整風運動中，敵人一定要來鑽空子的，他們的手段也不一定是正面的進攻，很可能從中挑撥，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共產黨與人民羣眾的關係製造磨擦，一方面可能拉攏一些立場不堅定的人，一方面向黨拋出幾個炸彈，嫁禍于人，造成人民中的緊張空氣，我們黨是久經鍛煉，有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的，當然不會不知道，同時我們也應該知道對人民內部是非問題，用壓是不能說服人的，最多只能使一些不敢堅持真理的人畏縮，使社會輿論消沉，使公開的正面的批評轉為暗中的不滿，使人民羣眾對黨的政策懷疑，使黨的事業受到損害。這樣的做法，什麼人歡迎呢？是人民的敵人，台灣和美國是很歡迎我們這樣做的。

1957年6月23日

（附二）我對肅反問題的看法

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後，我對肅反問題理解得還很淺，可以說，還

有些疑問。最近報紙上談論這個問題，意見頗多。我願將我的見解寫出來就教于大家。

報紙上有些人說，肅反是搞錯了，這句話，是很含糊不清的。我認為在討論之前，要把論點弄清楚。它是指有反革命不應肅呢，還是對這次肅反運動的總評價？前一種說法的人，可以說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我們是應該羣起而攻之；但後一種說法，如果他言之成理，也可以傾聽一下，作具體的分析，就不是正確的意見，也應以理服人。主要的是拿出事實來。但翻開報紙來，有些反批評是武斷的、粗暴的，甚至有人拿出文化公園捉到那個特務來吓唬人，這種態度是無助於討論解決問題的。

現在批評和反批評雙方都沒有拿出事實，不作具體分析，一方面認為肅反搞得很糟，另一方面認為搞得很好，但到底怎樣糟法，怎樣好法，誰也看不清楚，這樣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這次“鳴”“放”，是人民內部的“鳴”“放”，應該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來看問題，分析意見是可以在鐵的事實面前求得統一的。判斷這次肅反運動是好是壞（當然是從基本上总的情況說）的標準就要看它是利多害少或者是害多利少；同時還要看一下當時的客觀形勢如何，是有條件避免缺點錯誤，而不去避免呢，還是形勢迫着不得不這樣做。我不了解情況，不能發言。但就我所接觸到的材料看，肅反運動被鬥爭的人，約有80%左右不是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從我所接觸到的事來看，當然是害多利少了。不過全面情況是否這樣，那就不知道，所以不能下結論。我認為肅反是必要的，有反不能不肅，問題是如何肅法。這次肅反運動與三反、五反時的形勢是不同的。因為三反、五反時，資產階級向我們瘋狂的進攻，誰戰勝誰的問題尚未解決；但這次肅反運動，是在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肅清，社會很安定，人民羣眾生活日益提高，而且在機關內進行，條件和過去解放初期鎮反不同。我認為這次用運動的形式來進行肅反是不必要的，是完全可以個別偵查，按照平時對付反革命分子的辦法去進行。因為在運動之初，誰是重點，是領導決定的，也就是說，領導上是首先掌握到一些可疑的材料才進行鬥爭的，並不是領導上甚麼都不知道，一定要發動羣眾起來才掌握材料（羣眾起來後，材料當然更多一些）而且凡是隱藏在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說是成了釜中之魚。目前，我們社會上對反革命分子來說，是布了天羅地網，既然我們自己先已心中有數，是可以採用長錢釣大魚的辦法，來偵查逮捕。還應該指出的是機關的羣眾，都是幹部，就是不搞這次運動，領導上掌握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來發動羣眾繼續鍋釜，而不必搞運動。這次肅反運動中，對機關中重點的百分比，以及發動之

初，雷厉风行的来一个反右倾麻痹的做法，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助长了缺点和偏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可以全国统计一下，搞错的多少，对的多少，有多少反革命分子是可以采取个别侦查描述的？有多少是根本不知道，一定要搞运动才能查清的，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了。

五、省水利廳右派分子許志材料

許志，男，共青团員，現任水利廳水利工程局辦事員，家庭成份破落地主。本人曾在伪三師九團当过勤务兵，起义后改編我軍。后曾因犯錯誤受降級（由排級降为班級）处分，复員回家。到局后，工作一贯不負責任，經常散播不滿言論，拉攏落后分子，对党抱仇恨态度。其主要反动言行如后：

（一）党派集团是爭权夺利的，工人、农民是木头公仔

一百条河流都归大海……什么農工党、“狗工党”，什么党也是为了其集团利益，都是“自私自利”的，……所有党派的“勾心斗角”都是为了“爭权夺利”，为了“爭官做”，因此不管有能力沒有，这个党派要照顧，那个党派也要照顧。水利廳几个廳長，市有几个市長，如果我是某些党派头子，我也会是个什么長，照顧來照顧去，只加重農民的負担，这个長要一、二百元，那个長要几百元，什么党也好都把農民当作“木头公仔”，舞來舞去，对工人也是一样，所以我認为什么党也不要，有了党就有爭权夺利，最好是誰有能力，誰就來領導，要就要个“人民党”，为人民利益的党……。

（二）党世界

共產党99%是自私自利的，只有一个×××不是，工程局黨員也是99%是自私自利的，如林明自己当人事科長，自己領补助金，所以党是最大的資本，錢由你管，人事由你抓，你要补助就补助，你要怎样就怎样！房子你要多，單車由你騎，怪不得大家說是你的世界了！

党就信自己的黨員，黨員可以說你不好，会恨你，你就不能說黨員的缺点，总结时

有成績就是黨的黨員的領導的，有過失就是羣衆的。

(三) 農村統購統銷搞得很糟

農村統購統銷搞得很糟，農民有的不賣，但卻進行搜屋！解放後，黨在農村做了很多工作，如土改……鎮反……等，但現在似乎不准農民講話，只准講好話，政府對統購統銷搞糟了，餓死了很多農民，結果農民起來包圍鄉政府和區政府，有的鄉長和區長都被農民打死了，有的被打傷了，造成有的鄉長區長不願領導了。

(四) 農民市民餓到面黃骨瘦

農民生活很苦，政府也不理，農民每天只吃兩餐粥，如羅定、茂名、高要等地，好的靚布就在城市賣，每尺只兩三角錢的粗布就賣給農村，如婦女好烟專門同工人做生意，農民就無份，我認為工人農民生活相差很多，有天與地之差！

就拿我們茂名來說吧！在統購統銷時，也餓死了很多農民，我的母親就在這時候餓死的，特別嚴重的，有一次，有一個農民因交不出公糧和賣糧給國家，但鄉府不講道理，和國民黨軍隊一樣，當他抗拒罪名，派民兵到他家裏進行搜查，沒有查到什麼就從他到鄉府審查，後來我到了湛江，我親眼看了很多農民和一些市民餓到面黃骨瘦。

(五) 土改搞到我家散人亡

土改時，我家當地主斗錯了，搞到我母親因此餓死，父母去乞食，我七個兄弟賣了兩個，搞到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家破人亡，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制度和現在生活確化了。現在我什麼都不想講了。

(六) 派出所“有賊捉賊”，“無賊做賊”

我曾和派出所過過團組織生活，對他們情況很了解，從所長到辦事員“有賊捉賊，無賊做賊”，例如解放後幾年來，農村很多地主的女子，由於她長得漂亮，有的準備到香港的，但派出所為了這些女人，故意不發給她們通行証，後來只給她們很多錢，有的給她們通奸了，農村來的女仔，派出所利用給她填戶口，找工作的手段，從中和她們結婚了，派出所借口去居民宿舍檢查戶口，其實進行勒索和搞不正當關係。

(七) 我有一万八千可以自由自在

老实說：如果我許志現在有一万八千的話，混×帳，我要这样辛苦捱批評！？最多你开除了我团籍，开除了我出去，你慌我会餓死？相反的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今日在广州，明日在天津、上海，总之我愿意到那里就到那里，我有个朋友原来是窮光蛋，給他搞到了兩部車咪，現在撈起來了，有收音机，生活得很舒適，我許志倒霉，沒有撈起來。

(八) 什麼“話”？

曾对一个轉業軍官說：他們（國民黨）有美國幫助，目前又發明了導彈，且導彈部隊已开到台灣，英國又侵略了埃及，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会打起來的，國民黨打回來，首先殺的，毫無疑問，是你戴友，因為你是黨員，我許志（團員）不會殺的，最多坐几月牢。你虽然是軍官，但你沒有文化，又沒有技術，你有什么了不起，万一机关不要你的時候，你在广州撈撈，看會餓死你的，总之我認為这个社会生活只要你有文化、有技術，就有本錢，什么都行，我見過几个轉業的老革命，他們是團長、營長、連長，現在都沒有工作，有的只好做手工業，他們官比你大，到底何在呢？可是有些人，過去是大学生、教授，不管他過去做什么，今天共產黨就要他，每月還給他錢。（水利廳羊凡、凡牧整理）。

六、省交通廳右派分子關中材料

關中，交通廳佛山管理所檢驗員，在鳴放運動中散布各種反動言論，說：“中國沒有共產黨，人家不會賣國”，“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好”，極力支持儲安平、葛佩琦、章伯鈞等人的反動言論，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其反動言論和一言表現如下：

(一) 反動言論

在鳴放運動中對黨的領導極端不滿。他說：“目前社會上有兩種現象：一種是黨

吃飯，一種是靠技術能力吃飯。黨竟吃飯，我什麼時候也不同意。現在黨吃飯的黨員科長，叫他們到功勛院去，讓有才干的來干。”又說：“局里（公路局）選出的先進工作者，都是不三不四，吹牛拍馬的人物”。他還露骨地說：“中國沒有共產黨，人家不會賣國，蔣介石在台灣，人家也沒有賣國。”

他說：“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好”，“中國人民都不願解放，共產黨是強加解放”。“統購統銷確實有很多問題，如此下去買不到豬肉吃，机关干部面黃肌瘦”“如果公安應對出口工作放寬，平平等係全部都要到香港去。”

在運動前，他曾極端露骨地說過：“如果有人給我錢，我什么都干，甚至叫我去爆破。我試車時，如有負責人坐在汽車上，我就把車开到溝里，同归于盡。”這次運動中，他又說：“局（公路局）不要被樂觀所蒙蔽，問題多，且嚴重，如果追上梁山就難办了。”他說，如果有人打击报复他，就“追上梁山給你們看”。

他还支持儲安平、葛佩琦、章伯鈞等人的反動言論。他說：“把胡風和儲安平比，使人害怕。人家說話不是无根据的，不能把人家意見当成反動，不應駁斥”。如“國務院12個副總理，无民主人士，都是黨員，确实值得考慮，确有‘清一色’思想，統戰工作有問題”。象“王首道副部長可提为办公室主任，統几个部；章伯鈞为什么不能呢？”他也不滿意公路局黨的領導，他說：“局內是事无大小都是看黨員气色行事的現象”。而“羣众对黨員有見鬼神而避之的現象。”局里“有些會議我們不能參加，什么也不知，對我們留用人員有懷疑，不相信中、下層干部，只是三心二意的。”他說，共產黨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打游击都是偷雞摸狗，穿破皮鞋，現在才坐小汽車。”

他完全同意葛佩琦的言論（只有最後一段說殺共產黨，不同意），認為葛的意見可作參考，不同意加以批駁，批駁就不是“言者无罪，聞者足戒”了。

他也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他說：“我看章的發言找不出什么問題，雙輪雙鋒車講實錯誤，浪費很大；文字改革，扫盲确有問題。目前報紙对章等人批評是沒有事实的。”

他支持章乃器 的言論，他說：“我同意章乃器說：黨党相护 的話，因为許多黨員互相对錯誤庇护。”

（二）歷次運動和平時的思想表現

一、歷次運動的表現

1. 三反运动时因参加集体贪污集团，拒不坦白，被迫交待打为老虎，三反后又有贪污，同时对三反结论不满，讲怪话。

2. 整队时因伪造历史隐瞒参加海軍一段历史，本人被迫交待一半，后送公安廳西村集训队，才作了彻底的交待。

3. 肃反时同情支持斗争对象，散布不满的言论，为对象辩护。

二、平时思想表现

1. 广州解放初期，敌机空投反动传单，关拾到后拿回从化管理所进行宣传说敌人确定在3月3日大爆炸，当被领导发觉立即停止本人的活动。

2. 解放很久时间，关每次领到的工资立即换为港币，同时号召大家说人民币没保证，港币有保证，替同志们兑换港币数次。

3. 经常说美国的东西很好，苏联的什么东西都不好。

4. 下鄉抗旱返机关后同大家讲农民对政府不满，基础不巩固三定不能搞，还说該区区委書記，他如果在公路上走我开车先把他碰死，骂監理所長是狗腰子爪牙，什么他都向上級反映。

5. 誘奸合作社工友吳先球后怀胎，嬰兒出生后，关拒絕不負經濟上的責任，引起該同志曾一度想自殺。

(三) 隨感

关中，原名关士奇，曾用名关脱成、关崇信，广东开平縣人，現38歲，家庭成份貧農，个人出身伪職員，文化程度小学畢業，現有初中文化。从37年7月至49年10月达12年之久在伪国民党交通部門担任过助理員、課員、會計員、办事員、事务員、助理監察員、技佐、雇員、站務員等职务。解放后1950年参加工作，在交通部門任过站長、檢驗員、代理所長檢驗員等职务至現在。其社会关系極复杂，解放前和国民党一些高級官員有密切来往；解放初期，还和两个国民党現行特务有过来往。

七、省城市建設局右派分子黃頻華材料

黃頻華，男，23歲，廣東普寧縣人，羣衆，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學生，1956年7月參加工作，現在廣東省城建設局標定隊工作（試用人員）。

運動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一、6月17日在小組座談會上說：儲安平“黨天下”的提法我很同意，許多黨員存着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的思想。“所以我們是領導者，我們有決定一切的大權，你們不能如此，我們說的做的都是正確的。你們一切都該打下問號，自以為高人一等”，這是黨天下。認為對儲安平等右派分子的批判是“政治壓力”會產生收的副作用，妨礙放鳴的發展和違背放鳴的方針政策。

懷疑和風細雨是否解決問題，是否廣大羣衆有意見。①過去各個運動都是“狂風暴雨”，今天整到自己（指共產黨）就和風細雨，豈不是宗派主義的表現。②“三害”對人民革命事業危害不淺，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加之三大敵人十分頑固，非用猛火不能解決問題，我主張處理這些人要分別情節輕重給予教育、警告、降職、撤職、坐牢、槍斃等不同待遇。

二、7月3日下午在小組會上說：共產黨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三人我完全相信，其他的共產黨員我不相信，因他們都是官僚主義，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會上有人問他，“朱總司令你相信嗎”黃答，“我也不相信”。

三、6月14日在小組會上說：試用人員是奴才，是階級社會等級殘余的產物，試用人員的說法是違反憲法的。

6月16日又以題為“不平則鳴”的大字報說：我的意思是試用有留用之意，實有留與不留、去與不去、試用者與被試用者之分、有治者與被治者、管與被管者、太山與螻蟻等等級制度之意——堅決反對試用的說法。

當同志們批駁他上述論點時，他不服，又以“談忘本”為題的大字報說明，試用人員可以呼之而來，揮之而去，如不順服貼聽從官僚主義的領導便有同鄉生產之危險。

四、6月下旬煽動標定隊起來罷工，（因個別同志反對未成）結果，用標定隊者又寫了28條標語以示反對局領導。

八、省服務廳右派分子藍宗棉材料

藍宗棉，男性，現年27歲，廣東澄海縣人，家庭出身華僑工人，本人成份學生，文化程度初中畢業。1951年7月由南方大學分配參加革命工作。現在廣東省服務廳干鮮果商業處任科員。1950年7月在南大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5年“肅反”期間因入團手續不清，當時結論為混入團內的壞分子，被清除出團。

1. 一貫來的表現：

藍宗棉參加革命以後，一貫來對組織不滿，自高自大，盛氣凌人，看不起羣眾。尤其肅反運動結束後，對黨不滿表現更為突出。如去年他說“一切事情做壞都是共產黨搞的，要想不犯錯誤，把共產黨員都殺掉就好了”等。整風運動開始後，藍就抓住這個可乘之機，大肆向黨進攻，有意製造謬論，辱罵黨中央的領導，但同時又裝出一個老老实實幫助黨整風的好人，而經常為自己的言論辯護。

2. 運動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藍在6月5日座談會上說：中國共產黨既然是馬列主義的政黨，但為什麼會存在“三害”。這與其中成員的作風分不開，黨內存在着反馬列主義理論是不少的。黨對過去的任何運動非搞得過火不行，結果顛顛倒倒，一左一右的。劉少奇同志在廣州報告談到關於城鄉生活差別問題時“幾乎所有城市的人都吹牛”“幾乎所有鄉下人都訴苦”的說法不是實事求是的，他沒有了解情況。而實際上城鄉的差別是存在的。如果農民群眾聽到此話，會引起什麼反映呢？到底劉少奇同志還感到中國有那些人可以相信呢？劉少奇同志以城鄉福利補助和救濟支出說明城市的苦是不夠客觀的，他不了解福利救濟中存在很多問題，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原則的。所有這些問題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能找得到嗎？

我們國家沒有法律，憲法不能保障人權。如肅反運動時期，由於沒有法律保障人權，單以領導職位來代替法律權力，打人罵人、搜查、扣押等違法亂紀行為層出不窮。肅反運動一開始就走上偏差，所打的大部分是自己人。而違法亂紀分子被認為是骨干領導分子，得到信任和提拔。

6月13日藍又提出書面發言材料，內容大至與6月5日發言相同。首先提出黨內存在着反馬列主義的理論是不少的，而且這些理論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一部分黨員思想中，作為行動指南，具體來說有以下几个問題：

1.唯階級論。黨看一切人，是以他的出身去看的，不是從發展去看問題，把一切看成是靜止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許多人是進步了，但也有一些原來成份很好的人如高崗之流都變了質。

2.“矯枉必須過正”，就是“寧左勿右”，這種理論否認了事物的正確性，結果使每次運動出現了不少偏差，宗派主義者和野心家們就用以進行打擊報復，將槍口對着自己人。

3.不可避免論。一切錯誤都是不可避免；每次運動後上級黨還拿不可避免來包庇在運動中違法亂紀的人。

4.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定義理解為批評者可以無事實的誣告，被批評者對批評意見不管是否事實一定要接受。結果違法亂紀的問題，打擊、報復的問題越來越多。

5.對特殊材料的解釋本來是說共產黨員應該不怕一切困難，能戰勝一切艱苦完成革命任務，但是有些黨員說他們是特殊人物。

九、廣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張象賢材料

張象賢，現市公安局九處預審員，原是超齡團員，後退團，男，28歲，廣東五華人，家庭出身中農（現已參加高級社），個人成份學生，文化程度大學（在廣州大學讀過半年）。1949年參加工作，先在本鄉政府工作，後調東江公學學習，學完後又調來廣州公安局任糾察隊員，辦事員，現在為九處科員（20級）。解放前一直在五華讀書，1948年8月，曾在偽羅定縣府當雇員半月，後到廣州大學讀書半年。1946年在五華縣立第一中學讀書時，曾集體參加過三青團，為一般團員，本人已交代，並作了結論。但在1955年肅反中，曾有人檢舉他是三青團分隊長，八處政治協理員曾就此問題找其談話，張表示不滿，背地曾說：“如果鬥爭我，就首先打死我愛人”。後經調查，否定了三青團分隊長問題。現家中父母姐妹等9人均在鄉參加高級社。其獨人、兒女共4人在本市依其維生。祖父曾任偽保長，現在鄉；叔父曾任偽縣府征收員，現在鄉；岳父是一個建築商人，現在香港；另2個妻舅，一個在香港，建築商人，一個在美國，洗衣。

張平日工作表現不好，工作消極，有點油條味道。這次整風運動開展以來，僅參加

過大放大鳴和爭論會一、二次，都沒有發言，且半途退場；但是在背地里却發表了許多不滿、敵視現實的話。這些材料都是找他周圍的一些同志座談、揭發、對証出來的（一黨員、三團員、二羣眾），現將張在整風開展以來的右派言行述下：

整風開始時，他見報上載有民主人士向中央統戰部提意見的報告後，即說：“整風是共產黨的一個圈套，因為找不到反革命了，讓民主黨派中計，之後再整一頓”。當他看見章、羅等發表的反動言論後，即表示同意，並且責怪“人民日報”為什麼不把全文登載出來，還連連稱贊章、羅等這些人“很有骨氣”“是天不怕、地不怕”。

至看見報上駁斥葛佩琦的反共言論時，他即說：“共產黨你們這班契弟，執到人家一句半句，便整人家。殺共產黨是對的，共產黨做不好應該殺。我同意葛說中國沒有共產黨也不會滅亡這句話，很對，沒有共產黨中國還是一樣的中國，難道會變為南國？東國嗎？孫中山過去搞的也一樣是有個中國。又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是對的，農民現在只有吃屎了！”看見羅翼羣的謬論時，他也表示同意。當廣州日報登了一幅羅下鄉受到地主、反革命分子的“歡迎”的漫畫時，他則說：“這是共產黨自己打自己嘴巴，那里有这样的事實！”

當看到史良批駁章伯鈞的謬論時，他說：“共產黨說整風不打击报复是沒有人相信的。整風一開頭就來一個打击报复”。“共產黨整風是一個圈套。現在民主人士狗打狗。史良因為國民黨抓去坐過牢，所以反對右派分子，跟共產黨走”。“左派是吃共產黨的屎，才替共產黨講話，打击右派”。當時，有個同志即反駁他，為什麼說是吃共產黨的屎？你自己吃誰的屎？張當即洋洋自得地說：“我是吃我雙手做來的，誰的屎都不吃”。

還說：“葛佩琦現在可能被捕了，因為他得罪了共產黨。我看他一生都抬不起頭了！”“這種人真的有骨氣，的確不怕任何人”。當時，他還指着另一個同志說：“你是左派分子，鬼頭仔，如果九處領導知道我在檔案室講這些話，一定是你講的。……我承認是右派分子。黃忠，現在我們兩個左右派來斗斗吧！”

最近，張還在其辦公室牆上貼了他寫的一首詩，詩文如下：

覺料世氣不古，

人欲橫流，

西子美庄偏遭東鄰之妬，

鳳凰屏羽竟效鸚鵡之鳴！

整風中及平日，張在其它問題上也發表了許多謬論，說：“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是美國，鋼鐵產量占世界第一位，什么都好”。當他說這樣，別人指責他時，他說：“你崇蘇，我崇美，有什麼區別的地方呢？”“半斤八兩，還不都是崇外國！”他還認為毛主席報告中駁斥一些人認為美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好的崇美言論不對，是不對的，說：“毛主席為什麼不去比一比別的方面呢？”平日也經常專找報上“世界珍聞”中的一些美國科學技術材料，一再向別人宣傳，叫大家去看看。經常說香港如何如何好，東西很多，很便宜，說：“共產黨光吹牛皮，什麼都沒有，吃也不好，穿也不好”。看到報上登載有美國經濟危機的消息時，則說：“老是經濟危機，既然是規律，還有什麼必要登這些東西”！又還說：“政治經濟學要修改了，過去罵資本主義象臭屎，但資本主義也有很好的地方，反而社會主義的價值規律是不對了。不然為什麼物價老上漲。這與社會主義的價值規律不是矛盾嗎？”（原話如此）。

還說：“蘇聯的原子彈不知道有沒有，如果有的話，為何不宣傳呢？”有人駁他說，毛主席都說有嘛，他說“毛主席說又怎麼樣呀？”

最近，報載我國抗議美帝破壞朝鮮停戰協定時，他即說：“人家違反協定，我們就提出抗議；我們違反協定，人家也是一樣提出抗議的。不過，我們不要緊了。”

有同志揭露他經常到二科去聽“美國之音”。并說：“我主張知識分子自由找工作，我不怕無事干，就去香港都可以找到工作做。”有同志就說，我就不敢去香港，國民黨特務機關會殺我們的。他即說：“我就不怕，相反的，國民黨歡迎我的。”當場有人指問他這些無立場的話，想去干反革命嗎？他說：“我將來會可能去干反革命的。”

又曾說過：“國民黨回來我們就無事了！國民黨回來他不明白那個是共產黨員，反正看到公安人員就要殺，我們這樣的人就執輸了。”

當他看到化整事件處理結果時，很不滿地說：“殺了農民便這樣處分算了；農民心中是死都會記得住這筆賬的”！“現在報紙尽是黨報，對共產黨有利的登了；但黑暗的東西則不登。”又說：“現在的民主，只是共產黨的民主，什麼民主？國民黨統治時，什麼報紙都可以看到，現在最多看到南方報、廣州日報，都是講共產黨好的。這是什麼民主呢？國民黨時期講錯都不要緊，現在講錯了，就不得了”。“見到報上登的關於广西餓死人事件的處理時，便在租里指給別人看，說：“你看，毛主席說不餓死一個人，

现在餓死5、6百人！处分一下便算了嗎？很惨呀！你不死当然不会感觉到”。

还有，他最近生了一个兒子，特地寫信到香港，請他的岳父（香港一建筑商人）給起个名字。

他的爱人，原来是一个比较好的同志，肃反中的积极分子。现在，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整風以来极少参加鸣放；最近有时来有时不来，也不請假，甚至提出了退团（她也是超龄团员）。

整風开始后，他同二个同志和一个肃反被斗过的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談私房話；他們的言論看来有互相呼应的地方。

最近他看到民盟中央發表关于盟内开展整風指示中提到請求共產党帮助他們整風的意見后，他則說：“这是用猪油來擦咀巴，你不請共產党其实共產党已經在你內部來整你了。还用你請；这其实是做样子，挂黑面招牌而已”。

当全國人民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又污蔑說：“百家爭鳴，百花齐放，是形式，这是共產党处世形式是共產党的法宝，要百家爭鳴，为什么又不保證言者无罪呢？现在章伯鈞象坐牢一样。台湾一些想回大陸的人，现在死都不敢回来了。共產党这些手法，聞到都怕”。又說：“共產党是騙人的，說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結果把人綁起来了”这些被人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正直的人，共產党便象釣魚一样，上釣的便衰。真是笨擦、笨擦（即傻瓜之意）。聪明的人是不愿多講話的，你章伯鈞这样一个交通部長，何必要講这样多話呢？”7月11日市公安局作反右派分子的動員报告大会，有同志動員他去参加，他說：“我是例外分子，我就不去听，你奈我何？你們开会來捉右派分子，我就不参加”。

（广州市委整風办公室根据公安局材料整理）

十、广州市衛生防疫站右派 分子罗中浩材料

这是广州市衛生防疫站一个干部罗中浩在大放大大鳴中（6月6日）所暴露出來的一份材料，它是通过上書中央領導同志的形式“放”出來的。在这份材料中，罗中浩对其

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對人民民主專政實行了非常明目張膽的猖狂進攻，對黨中央負責同志，對共產黨，極盡其污蔑、辱罵之能事。他叫囂着：共產黨“腐爛變質了”，黨員都是“為自己服務”、“個人利益第一”的“老妓”，而且由於黨、團員“盤踞在主要的崗位上”給“人民利益，帶來了無限的損害”；他認為：“幾年來農民政策錯誤不少”，“全國絕大部分農民耕者缺糧食，種豆乏油用，統購統銷弄得雞犬不留，節約糧食搞得豬母殺盡，農民飢腸轆轆，三月不知肉味”，“弄得民怨沸騰，憤聲載道”；他認為：“現在的中國是國民黨式特務統治的中國”，憲法是“擺個樣子”，人代會代表大都是“長袖善舞的可憐蟲”，“歌功頌德”或“傀儡式的教條主義者”；報刊是“強詞奪理”、“教導人民黑的也是白的”，人民在鳴放前是處在“密不通風的黑暗當中”，使得“多少工人、農民、職工、教授、學生、主婦……對共產黨……感到怎樣的憤慨！”他污蔑毛主席和“古時皇帝”一樣，听信“奸臣”、“狗腿”的“讒言”，“遭到人民的切齒痛恨”，這種情況，“今天，連共產黨員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會例外”，他非常狂妄地要中央負責同志對“今天的局勢”負責和“反省”；他威脅着我們，說什麼“再如此下去，激怒人民、忍無可忍之時”什麼“社會事件”就要到來，說什麼現在我們已經坐在“火藥庫”上面；最後為了“監督”共產黨改正這種“嚴重之錯誤”，他呼喚各民主黨派對“全國這麼普遍的共產黨員的錯誤”不要“置之不理”。

這是多么系統的、完整的一套反動言論！這是多么露骨的、惡毒的一齣右派面目！對於這樣的反動言論，我們必須堅決地毫不留情地對它進行批判、反擊。現將羅中浩所寫的材料打印出來，並附羅中浩的政治歷史簡況，以供批判、反擊時的參考。

（附件一）羅中浩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

一樣的中國，一樣也是共產黨來領導，可是，多少人民，却往往高興擁護着解放初期的共產黨，其實，這也難怪，因為那時的共產黨員的艱苦朴素、大公無私、以及關心人民疾苦的優良作風，實在不得不使許多人感動得痛哭流涕！可是今呢！變了！開始腐爛變質了。可不是嗎？現在多少共產黨員在大喊大叫“為人民服務”“革命利益第一”，可是做出來的却是“為自己服務”“個人利益第一”；目前，全國多少不學無術的黨團員（人家說他們是老妓，因為大多數也靠口食飯），盤踞在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結果

錯誤百出，貽笑大方，使神聖的人民利益，帶來了無限的損害。但是，另一方面呢！多少熟悉業務而又不会造反的人，却丟落冷宮、棄之不用或用之不當。多少黨員、團員，天天食飯、闔屎、睡大覺，却年年升職封官；而非黨團員却任你做生做死，沒份！多少黨團員犯了錯誤，是內部解決：“勸”；而非黨團員犯了錯誤，是大張旗鼓：“整”。過去的大公無私、艱苦朴素等品質跑到那里去了呢？事實是如此的普遍，這不是共產黨已在蜕化變質又是什么？象這樣的共產黨人，還可以說得止在“為人民服務”嗎？可是，尽管這是事實，還是有不少黨組織或成員，在利用各種立場、觀點來為他們辯護。難道人民是傻瓜？是瞎子？是騾子？

古時皇席左右，往往少不了有專呼“皇恩浩蕩”“天下太平”，另一方面又進讒生事、陷害好人的奸臣。該輩為討好“皇上”，不惜搖尾乞憐，以獲“青睞”。待一旦官星顯照之後，便免不了魚肉生靈，甚至禍延滅國。如此狗輩，歷代以來，不知遭到多少人民的切齒痛恨，我想，今天，連共產黨員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會例外。可是，二十世紀的今天（莫忘記：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這些奸臣又還出現。可不是嗎？多少長袖善舞、鼻柱白粉之流在昧着良心歌功誦德啊！多少別有企圖之流，在搜集“資料”，進獻讒言，以祈一領運到，躍躍龍門啊！共產黨既然也痛恨古代的奸臣，那末對於今日奸臣式的、挾肩諂媚之流又應該如何對待？對於敢說敢言之人，又應如何正確估計？是認為專事歌功誦德之人是好人？抑……？

今天，五億几的工人、尤其農民，還求行到“鳴”的福運（據有人推測：共產黨不敢讓農民“鳴”，因為幾年以來，農民政策錯誤不小）可是，只此少少的科學、藝朮……界鳴的結果來看，已証明這個矛盾不是小的，而是大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國性的。黨告訴我們：“幹部決定一切”，同時，我們也知道：黨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很強的，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向來是貫徹得很好的，然則那末，對於今天的局勢、和國內的上層黨政領導——如你，劉少奇、周總理、還有陳雲等應否負相當重要的作用：你們考慮過沒有？如果有，又準備怎樣採取正當的措施？

從我切身的体会，也不容否認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人民的希望。可是，在今天却弄得民怨沸騰、憤聲載道（不要以為我誇大事實，請到人民中去听听他們的心事吧！）黨、國、黨關係搞得如此糟，因此而給人民帶來的損失是如此難于估計。那末，（據我了解）負責主要黨務的劉少奇同志，有否反省過？正視過？為什麼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会如此的普遍：

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对干部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不多’”。他说的是全国占少数的城镇等农民；抑是全国性的？其实，全国绝大部分农民，还耕者缺粮食，种豆乏油用，统购统销弄得鸡犬不留，节约粮食搞到猪母杀尽，农民饥肠辘辘，可惜是“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农民的生活，还是十分值得憂慮的，怎能比上城市工人最低限度可以吃上飯呢？这些事实，刘少奇同志是否仍蒙在鼓中？难怪他言犹未了，便有些人说：“丢那媽！他（指刘少奇同志）敢到各县去对农民讲，农民不丢他杀我的头”和说“唉！刘少奇同志向这样说，难怪农民要受苦受难”了！全国报刊反映农民流入城市的根源是什么？

希望国家領導，勿再問道于盲，必須深入了解實象，对农民生活，作出有效的改善措施來。

我曾和一位共产党员同志談过，他虽不能同意，但也少不了“难于辯解”。这就是：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長袖善舞的可憐虫或者是傀儡式的教条主义者！否则任你工作得怎样好，也很难当上全国的人民代表。他们在开会时很少（也不敢）講到人民真正要講的話，只是歌功頌德或講些不关痛痒的話多。我看这虽不真，但也不会都是假的。因为从人代会上的發言，可以証明最低限度不会完全錯的，人民代表既不能大胆說出人民要說的話來，那末說代表大会能行使人民的权力那不是十分笑话？憲法規定：“人民有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看來，这也不过是擺个样子而已，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不相信嗎？到处是：只要說一些反映党的缺点的話，便会有許多“积极分子”反映上去，随之而來的往往是“大胆怀疑”“追查动机”，最后是“反动”“落后”……的帽子紛至沓來，弄得說話者几乎一世也翻不了身。这样就叫做言論自由嗎？有人比喻过现在的中國是“国民党式特务統治的中國”，話虽不恭，但确实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論出版自由嗎？也不过报刊清一色，形成“一家独放”，“一家独鳴”。个别不是嫡系的报刊嗎？也扣上了“緊箍咒”，只准講好，不准講坏，只准歌功頌德，不得反映缺点。甚至今天連鲁迅的雜文休也打入了冷宮，这不能不使人民翻臉罵克•吐温的遭遇，將不知何日会降臨到鲁迅头上！

当然，我不是要提倡反动言論，但是，不要用“豆腐格”方式來办报刊、不要強調

奪理教導人民黑的也是白的呀！要好的也要講、是錯的也要登，要多種多樣、不要教條墨守、不要動不動就把大帽子扣死人才能令人心服呀！

其他如集會、結社……嗎？更大家知道了！

我實在不禁感慨系之！我們是堂堂大國，而且又是人民真正擁護的領導者，英美人民所痛恨的東西，我們反拾過來當法寶用，而且某些東西還發揚了它，這真難免使人大大惑不解！

我們認為：如果那些自由、權利人民是不應該得到的話，那末，便干脆不要登到憲法上去倒還使人民心服些。為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反而向人民裝出一副愁鬱的面孔來，事實上又口惠而實不至呢？！

一個多月來的“小鳴小放”，已使人民有如釋重石，從密不通風的墨道當中，走入光天化日之下之感。人民透大氣了，全身細胞復蘇了，工作勁頭也躍躍欲試了，對未來的希望也感到也實際的美滿了。可是，人民看到許多領導人，尤其是許多黨報甚至是人民日報，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不願意“放”或“且放且收”之態，尤其人民還有根據地頭感著將來不知在那一天，在各種招牌掩蔽之下的形形色色的“整”會否降臨到他的身上。

我們認為：暗藏九年來的“火藥庫”（庶民大膽比喻）現在已經暴露出來，揭開庫門，拿下雷管已屬不難之事。人民需要什麼呢？他們的希望是怎樣的？人民無限的積極性能否真正解放出來呢？國家工業計劃能否按期或提早到來？今日能否妥善處理內部矛盾都有非常重要的關鍵！要知道：近來還少得非常可憐，並且絕大多數都還是顛抖着“鳴”出來的一些現象，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人民的“心音”。是且放且收的辦法來養攝“心音”呢？還是大放大開呢？是“家丑不外揚”的方式來處理“心音”呢？還是確實用大公無私把人民的利益看作高於一切的眼光來處理呢？我們認為：不讓人民說心裏話，或者限制着講心裏話，在處理時仍延用過去極普遍的“自己人”的方式來處理的話，這不僅是對人權的糟蹋而且是對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黨綱黨章的自我諷刺！

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解放以前，人民多么渴望共產黨來救救他們，解放頭幾年，人民是怎樣熱愛共產黨，感謝共產黨！但是，最近幾年來呢？多少工人、農民、職工、教授、學生、主婦……對共產黨又是感到怎樣的憤慨！連我这个在旧社会受过多少苦难、曾立志想做共产党员，而且在斯大林死时流过多少眼泪的人，最近2年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某共产党员也疏远掉。这是为什么呢？僅2年之隔，一樣的共產

覺覺在人民心中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深处，象你們这么重要的人，实有十分值得苦心思索的必要！

現在，社会上一片歌誦声，当然不是假的，因为人民感謝共產党擺脫他們的苦难、歡迎共產党的方針、憧憬着美好的未來。可是，能說这些歌誦声都是出于誠心嗎？那也未必！可不是嗎？社会上多少言行不符、長袖善舞之流，騙着他自己的良心在且歌且舞；多少對共產党虽然擁護，但又满怀憤慨的人民，由于不呼又怕人家扣大帽子，以致也不得不跟着应付一下。然則這片對共產党的歌誦声，假如說是完全真的話，那就不免太天真了！

“變了”的根源何在呢？除了前面所說者外（当然不見得全面或者都对）还希望做多想多听、不要讓“積極分子”把自己的眼睛蒙起來，不要說他們把自己的耳朵塞起來，要到外面去多訪多察人民的心声，以便能对症下药，加以解决。否則再如此下去，激怒到人民忍无可忍之时，社会事件一來，并非人民之福，亦非人民内心的願望！

当然，共產党有軍隊，有監獄，不怕他們造反。可是，自己做得不对，竟用这些对付敌人的东西来对付人民，这并不見得是十分光榮的事啊！何況人民本來是感激共產党、热爱共產党的呀！

我自幸生适遇晨，少生嫗骨。爰敢將所感所聞，綜合上寄，不悲之处，幸納精華，棄其糟粕，仍希見諒！

另方面，我还將此文，交民盟中央請轉發各民主党派，非有他圖，实不忍共產党目前如此嚴重之錯誤再行發展下去，假借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領導6億人民也領導我自己之党政領導，实行監督之意也！幸察苦衷，成甚成甚！

謹致

敬乳

广州市衛生防疫站

羅中浩啓

1957年6月6日

（附件二）羅中浩寫給各民主黨派的信

民盟、民革、九三學社、台盟、民進、致公党、農工民主黨……等中央負責同志：

你們作为國家政党的領導人，我現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际此國家朝气蓬勃，但又使人民受到許多不应受的苦痛之秋。我代表至少是我作为人民之一的意見向你們講些話：我認为解放以來各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中國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能說人民受了好处，全國这么普遍的共產黨員的錯誤就可以再行置之不理。我現在將送給毛主席的信，順抄一份給你們，正如信中所說的：“別无他圖，乃以信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領導 6 億人民也領導我自己的党政領導，实行監督之意”也。謹致

革命敬礼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

罗中浩敬啓

1957年6月6日

（附件三）罗中浩政治历史簡况

1957年7月13日

罗中浩，男，現年31歲，广东兴宁人，家庭出身貧農，个人成份職員。1942年在兴宁高中全書，1949年9月考入东江公学學習而參加革命，曾參加省公安部隊教導隊學習，市衛生局屠場搞文書、人事工作，現在是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行政管理科办事員，罗中浩在1943年——1946年曾在福建平和縣及厦門市东区等处任过伪警員，据該站材料說明，歷史經去年審干时作了調查，已基本上搞清楚是一般伪警員。

参加工作后的表现：1953年7月以前罗中浩在市衛生局屠場任職曾貪污旧幣30多万元，加以和同志关系搞得不好，因此調來市衛生防疫站。到防疫站以后，初期工作尚好，后来和站內工友鍾穗英談恋爱，并發生不正確男女关系，羣众意見很多，罗不僅不很好接受改正，反而大發牢騷，不上班，曠工，工作不負責任。当时为了嚴明紀律，曾給予罗中浩記大过处分一次。在工作上罗中浩是拒絕任何人对他工作提意見的，專橫独行，領導上鑒于他工作越來越差，和任何人都合不來，羣众意見紛紛，因此在今年4月把他調出去搞衛生运动，但罗更感不滿，認為領導上对他是一脚踢开。

比較突出的是在这次大放犬鳴过程当中，特别是在6月上旬罗發出了很多污蔑党和仇視党的反动言論，对于报章上当时所登載的葛佩琦、儲安平、罗隆基、章伯鈞之流的反社会主义言論十分贊揚。6月13日晚有几个人在圖書室閱报时罗即發表其党惡言論，稱

合有下列几点：

1. 解放初期共产党威信很高，他自己也认为是相信党的，但他說，以后他看到了共产党也和过去歷次改朝换代一样，“所謂一朝江山到手就变了質”，說共产党从1953年起威信一落千丈。2. 說工人剝削了農民，農民生活很苦，他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在省市干部會議上的講話。3. 說解放后党給工人和農民除了三大敵人，但給知識分子以几輩子以來从未有过的損害和侮辱。4. 說各民主党派是应声虫，在共产党压迫下不敢出声，他說，他曾寫信給張治中質問他为什么不能代表民主党派發表意見。

罗說这些話當場有人是不同意的，但他却說，你听就听不听隨便，明知你不愿听，但我也要講。在小組会上罗提出共产党騎在人民头上的謬論，当时一些人起来反駁，但罗橫蛮地不許人反駁，說反駁是维护缺点錯誤者。罗中浩这次寫信給中央，寫了以后曾經給过5个人看，并公开的在科室內厨房內对着职工宣讀。但这些人看了以后沒有表示反对。

罗中浩在这次学习过程中，非常積極，对于反动言論不但贊賞而且把他認為精彩者摘錄出來，等在小組討論时拿出來加以發揮。